

东江抗日根据地选址考析^{*}

李 翔

中共华南党组织自 1936 年重建起，即对未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进行选址规划。1938 年底至 1939 年初，华南党组织为应对日军登陆大亚湾，因地制宜，在东莞、宝安、惠阳沦陷区域组建曾生、王作尧领导的抗日游击队。^①在此后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曾、王两部虽然受到日伪军队、国民党军队的多重夹击，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扩大武装力量，不仅立足“东宝惠”，^②建立大岭山和阳台山根据地，而且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不断向周边扩展，形成以“东宝惠”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在军事和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开拓了中共领导华南人民开展敌后抗日的重要战场，而且孕育了被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的抗日劲旅——东江纵队，为未来革命的发展和壮大积蓄了武装力量。

学界对中共在华南抗日活动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③但对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对华南党组织为何选择以“东宝惠”作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缺少详细考证。本文主要依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

^{*} 本文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特别委托项目“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华南军队建设史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① 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游击队名称变化较多。1939 年春至 1940 年 8 月，两支游击队分别称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下文简称“新编大队”）和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第二游击大队（下文简称“第二大队”）。1940 年 9 月，两支游击队抛弃国民党军队番号，分别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1943 年 12 月，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合组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另，1940 年 5 月，毛泽东称中共华南抗日武装力量为“华南游击队”。中央书记处 1940 年发给广东省委的“五八指示”，称曾生和王作尧两支游击队为“曾、王两部”，本文“曾、王两部”的简称即取自“五八指示”。分别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53 页；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46—47 页。

② 本文“东宝惠”的简称，取自 1940 年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五八指示”。参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第 46—47 页。

③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共华南抗日武装斗争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如左双文：《华南抗战史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朱妹璇：《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年；《东江纵队史》编写组：《东江纵队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珠江纵队史》编写组：《珠江纵队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韩江纵队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编：《琼崖纵队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陈瑞璋：《东江纵队：抗战前后的香港游击队》，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 年；邝智文：《重光之路：日据香港与太平洋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5 年；等等。

委文件，并结合尹林平、曾生、王作尧等人的回忆资料，试图对以“东宝惠”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选址问题进行梳理和考析。

一、多项选址计划被迫搁浅

自1936年华南党组织重建至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前后，中共拟定的在华南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区域相当广阔，涉及数省。但在这一时期，受制于华南党组织建设的不成熟、武装力量的薄弱以及对客观形势判断上的不切实际等主客观原因，不仅闽粤边、广西等地的军事活动严重受挫，所拟定的在罗浮山、桂山、五岭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均未能实施。

（一）闽粤边、广西军事活动受挫

1936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下文简称“南临委”）在香港组建。在南临委布置下，两广、香港、闽西南、云贵等地党组织得以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复建，是中共在华南地区开展军事活动的前提条件。

1937年3月下旬，南临委向中共中央提出未来华南抗日武装斗争的规划，即“建立云贵边、云桂边、闽西、闽北、韩江上游各赤区的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加紧义勇军及一切民众武装的组织工作，特别着重向闽粤边、闽南的壮丁队、民团开展，使之与红军、游击队配合”；并把军事活动区域重点定位在闽粤交界的山地一带，认为这些地方虽然是“最受敌人威胁的地区”，但有留守红军作为依托力量。^①可以看出，南临委这份报告沿用了民国时期广义上的“华南”概念，范围包括除台湾之外的云、贵、桂、闽、粤五省。但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仍未放弃消灭华南中共武装力量的企图，“向闽粤边，闽西、北，云桂边的红军游击队继续进攻。为要维护其统治权位，依然害怕革命、害怕群众”。^②这无疑是影响南临委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最大阻力。

针对日益变动的复杂局势，1937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统战、合法、武装民众、改造民众武力等白区党务和军事活动的原则，明确作出国统区党组织要在“抗日战争已经发生的地区”^③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937年9月，中央为加强华南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又派张文彬至华南参与南临委的工作。

1937年底，中共中央为了维护全国统一抗战大局，也为了“答复国民党的某些要求，以利团结抗日”，^④主动对南临委进行改组，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下文简称“南委”），将原南临委领导的闽粤边特委、厦门工委、闽中工委和潮梅地区的党组织划归中共闽粤赣边省委领导。12月份长江局又作出决定：“各地区的游击部队应迅速集中，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今天的政治形势转变，应拿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上去。”^⑤1938年初，闽粤边红军改编奔赴苏皖抗

① 参见《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给中央报告提纲》（1937年3月28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广州：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1987年，第18—19页。

②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给中央报告提纲》（1937年3月28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11页。

③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2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华南抗日游击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⑤ 《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12月23日），转引自林天乙主编：《中共闽粤赣边区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

日前线。这样,华南地区本来规模不大的红军游击队,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华南作为战略支点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基于此,南临委1937年3月所拟定的在闽粤边开展军事活动、壮大红军队伍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广西地区也面临类似困境,甚至更为严峻。“过去桂西党与广西当局谈判是离开原则的,当局完全以‘收编土匪’对之。”南委虽然也认识到“今天广西局势与我们的力量是很难有正确平等、合乎原则谈判的成功的”,但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仍强调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不要提太高条件,认为“只有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策略下坚持一时的约法存在势力”,保持住组织独立与抗战立场就可以和国民党合作。^①1937年12月初,桂系正是利用这种心态,在百色谈判中诱骗改编中共滇黔桂边游击队。^②在这种背景下,南委“创造我们”、“扩大X万红军”^③的目标在闽粤边、广西不仅无从实现,反而损失若干游击武装和游击区域。

(二) 无法实施的桂山、罗浮山和五岭根据地计划

闽粤边、广西地区军事活动和选址计划的受挫,意味着中共依托华南原有红军游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计划落空。与此同时,日军对广东步步进逼,迫使国民党广东当局开放民众抗日自卫运动,主动改善与中共的关系。随着局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也开始将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及根据地的选址向广东聚焦。1938年4月,南委改组为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委成立后,并没有把抗日根据地的目标直接锁定在“东宝惠”,只是计划在惠阳建立中心支部或区委,领导海陆丰、龙川、紫金等地工作。^④面对日军入侵华南的日趋明显的迹象,1938年6月,中共广东省军委决定“在罗浮山和桂山建立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⑤准备“在日军登陆时把武装队伍集中起来开到河源县的桂山”,“以罗浮山和桂山为中心,领导广东东部的抗日力量展开游击战”。^⑥综合当时各方面情况判断,这一计划没有实施的基础:一是罗浮山、桂山一带没有中共掌控的武装力量;二是如实施该计划,需要周边地区配合,惠阳和东莞离罗浮山、桂山较近,但党组织在这两个地区开展武装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动员能力有限,而且容易引起人心浮动,“许多地方同志都没有坚持在地方上工作的决心”。^⑦

广东省军委这一方案公布后还没来得及实施,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在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又向中央提出新的抗日根据地建设计划,请求中央“将中共赣南特别委员会划归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以便在粤北一旦沦陷时,广东省委统一指挥五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⑧此即

①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报告》(1937年12月12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81—82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38—240页。

③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给闽粤边区特委指示信》(1937年3月5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5、7页。

④ 《中共广东省委南杰给长江局的报告》(1938年5月24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178页。

⑤ 尹林平:《鏖战华南敌后的东江纵队——纪念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黄玲主编:《深圳党史资料新编》,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第528页。

⑥ 王作尧:《东纵一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⑦ 《中共粤东南特委给广东省委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2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49页。

⑧ 沙东迅编著:《广东抗日战争纪事》,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在闽粤赣湘桂交界的五岭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按照张文彬的设想，该计划以东江区、潮梅、闽粤边互为犄角，建立中共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连片根据地，“着重沿海尤其是东江区，划出除潮汕梅区外，以海陆丰、紫金为一区，而以紫金为后方根据，过去东江红军也曾如此，现在潮汕驻军也以此为后方。以东莞、宝安、惠阳、增城、博罗为一区，而以增城、龙门为后方根据。这两区连合都以和平、连平、龙川为总后方根据，汇合潮梅以至闽粤边共同进行游击战争，是个很大的回旋区”。^①在这个计划中，东江下游的“东宝惠”有一席之地，但目标是服务于增城、龙门；而增城、龙门又服务于和平、连平、龙川，以此步步递进，层层发展，从沿海到腹地，由一省到多省。

那么，如此宏大的计划该如何实施？张文彬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下组织非公开由我领导的地方民众武装与游击队，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必须准备将来独立在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这应使古大存部巩固扩大成为新四军的合法大队，将来游击战争即以此为中心扩大。同时准备现在隐蔽的独立领导的武装，准备到直接游击战争时再来公开加入新四军，公开取得党的公开领导，但这一方针还应是次要的。”^②

和广东省军委拟定的在桂山、罗浮山建立根据地计划相比，张文彬构想的五岭根据地计划则更为靠北，且涉及数省，完全脱离实际。首先，他预设五岭地区必定沦为日占区，而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日军并未在粤北登陆，而是在惠阳上岸，东江下游的“东宝惠”才是“抗日战争已经发生的地区”。其次，张文彬对早已不成建制的古大存部抱有幻想，甚至计划将古大存部扩大成为新四军的合法大队。而实际上，国民党对中共在华南发展武装力量戒心重重，尤其是对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第十一军军长古大存处处防备。张文彬对当时古大存的情况并不了解，在他提出这一方案不久，广东省委就收到国民党通缉古大存的情报：“经缪培南等控告，中央已有密令通缉古大存。英（指云广英，引者注）退古国币二十五元，嘱暂避。我们已嘱暂避，静观情况。”^③再加上中共在这些地方领导的武装力量极其薄弱，因此，这一脱离实际的计划同样无法实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已。

二、初进“东宝惠”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13日，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华南党组织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④12月2日，曾生率领的100余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成立。1939年1月，王作尧带领的东莞模范壮丁队一部和黄木芬^⑤等领导的游击队合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约120人。中共中央和华南党组织之所以选择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除了这里是沦陷区，位于抗日斗争最前沿，还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①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34—335页。

②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36页。

③ 《中共广东省委致赵悦并中央书记处电——关于有密令通缉古大存及嘱其暂避问题》（1939年1月5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41页。

④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东江纵队史》，“序言”，第1—2页。

⑤ 不久，黄木芬离开东宝惠边游击队，队伍改由王作尧负责。但广东省委1940年前的工作报告，仍称曾、黄。中共中央1940年5月8日的指示，正式提出“曾、王两部”的概念。

一是当地已成立党组织并掌握着一定的武装力量,而且群众基础较好。早在1936年10月,党组织在东莞就成立特别支部,翌年8月改组为中心支部。1938年4月,东莞成立中心县工委,兼管宝安、增城两地的党建工作。在党组织的宣传下,这一带的党员和群众愿意为军事活动贡献钱物。东莞模范壮丁队成立时,“许多同志都从家里带来现款或金器,献给了部队。”^①这一时期,中央对华南党组织的建设和军事活动的开展给予支持和帮助,不仅选派两广籍贯或在两广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党员干部,到华南协助曾生、王作尧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而且在华南抗战爆发后,中央指派张文彬从延安带回梁鸿钧、李振亚、谢立全、谢斌、庄田、卢伟良等十多位参加过长征的中高级军事干部,充实和加强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②

此外,曾生和王作尧都是东江本地人,有一定的人脉,他们回到家乡创建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正如曾生所讲:“一、我是东江人,会说客家话,便于同群众沟通;二、东江目前没有统一的党组织,只有若干党小组和个别分散在各乡的党员和由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服务团名义派回去的党员,目前在惠阳、宝安沿海地区活动的党员全都同海委联系,受海委领导;三、我本人是大学毕业生,这个招牌在乡间有点名望,有利于团结上层人士;四、我家里还有几千斤稻谷,足以应付组建武装初期的需要。”^③也正基于此,“坪山成了我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最早建立的一个坚强的抗日游击基地”。^④

二是日军在广东分布的态势,给华南党组织在“东宝惠”创建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留下了空间和可能性,这一带山区的复杂地形也有利于小部队回旋。日军登陆之初,“兵力单薄,只守着淡水、下涌、惠州几个重要市镇,不离开公路线出发。”^⑤1938年11月底至1939年3、4月前后,日军为巩固对广州的占领,“向广州外围进行了比较大的三次的扫荡”。^⑥其兵力在广州及其外围有一个半师团,包括十四师团全部和一〇八师团一部。1939年3月,日军为收缩防线自动放弃惠阳等地。^⑦对日军在广东的分布态势,华南党组织有较为清醒的判断,认识到在惠阳、东莞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惠阳在这几县中是特别重要的,它被敌人占领最先,损失最大,在游击战中地位也最重要。”^⑧惠阳籍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甚至认为:“不搞抗日,那是天诛地灭。我这里有电台,与东江、坪山又接近些,工作方便些”。^⑨而且惠阳、宝安与香港山水相连,交通便利,是内地与香港物资运送的重要通道,有许多人在香港

① 王作尧:《东纵一叶》,第50页。

② 尹林平:《纪念张文彬同志》,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怀念张文彬》,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8年,第54页。

③ 《怀念曾生同志》编辑组编:《怀念曾生同志》,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6年,第67—68页。

④ 《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⑤ 《粤东南特委工作报告》(1939年1月2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55页。

⑥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广州: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1987年,第70—71页。

⑦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第145页。

⑧ 《粤东南特委工作报告》(1939年1月2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47页。

⑨ 廖承志:《关于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及对张文彬同志评价问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怀念张文彬》,第49页。

做工或侨居海外，他们头脑都比较开通，“爱国情绪特别普遍深入”。^① 这些因素，对党组织开展民众抗日动员非常有利。

除上述有利条件之外，惠阳、东莞一带的山区也非常适合开展游击战争。譬如大岭山，从北向南逶迤曲折，屹立着水帘山、马山、莲花山、马鞍山、宝山、大坪嶂山等几座较大的山峰，而在这些山峰的四周是像章鱼触须一样的小山包形成的山梁，山梁与山梁之间是狭长的山谷，到处是浓密的竹林和高大的树木，山岭纵横，沟壑交错，是“发展游击战争的理想的地区”。^②

三是在日军高压下，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领导的小规模武装力量的依靠，客观上也给抗日游击队伍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1938年11月底、12月初，日军对“东宝惠”进行扫荡，国民党防军1万余人溃败，“东宝惠”成为“完全沦陷区”。^③ 1939年3月，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游击队进驻坪山、^④ 龙冈、乌石岩。^⑤ 4、5月，东宝、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分别改编为新编大队、第二大队，曾生、王作尧分任大队长。不久，中共东江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这两个大队。“这两队建立的时候，给当局帮助很大，收下三四百散兵，收复东莞、惠阳两县的政权，有三千正规军愿到我们新四军来和接受我党的领导。”遗憾的是，广东省委机械理解统一战线中的“统一”，过于依赖余汉谋，“所以放弃了这个部队的争取，便把这个部队送回当局”。^⑥ 曾、王两部错过了极好的扩充机会。尽管如此，“游击区中真能作战者很少，还是以东江曾生部较强”。^⑦

正是借助于上述有利条件，以曾生、王作尧领导的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为主力的抗日游击队得到较快发展。1940年初，曾生、王作尧两部规模分别达到“人五百余，枪三百多”，“人三百余，枪二百余”。^⑧

然而，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对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防范和限制不断升级。1940年1月后，东江一带国共之间的摩擦日趋激烈，据中共广东省委青委报告：“东江——包括海陆丰、惠阳、河源、五华、紫金、和平、连平、龙川，这里是最富革命传统地区，农民阶级意识最浓厚，同时是逆流中心地区，统线最困难，K（指国民党）通常认为我们力量最强他们最弱的一环，有‘不惜增强磨擦’的表示。”^⑨ 尽管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华南军事力量以民众武装的身份开展活动，但国民党在了解到曾、王两部的政治面貌后，更是步步紧逼，不断加大军事打击和围堵的力度。3月9日，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纠集所属部队3000余人，对曾、王两部进行

①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02页。

② 王作尧：《东纵一叶》，第10页。

③ 《粤东南特委工作报告》（1939年1月2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54页。

④ 《粤东南特委工作报告》（1939年1月29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57—358页。

⑤ 王作尧：《东纵一叶》，第71、78页。

⑥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第185—186页。

⑦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第74页。

⑧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书记处报告》（1940年2月12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第27页。

⑨ 《中共广东省委青委给中央青委的报告》（1939年11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465页。

围攻，使其在军事上陷于被动，被迫撤出“东宝惠”，向海陆丰突围。突围中，曾、王两部人数从800人减少到“百余人”，损失惨重。^①

三、立足“东宝惠”

华南游击队遭受一系列重大挫折，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1940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报告，对广东省委在军事工作中消极保守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工作方针，应把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发展进步势力的中心，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②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均在抗战”。只要有敌人存在，均应发展。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③这一指示，无疑对面临巨大困境的华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5月8日，中央书记处给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游击队发来指令：“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矛盾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战与打磨擦仗。曾、王两部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日寇进攻，而向我后方行动的政策，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国民党会把我们当土匪剿灭，很少发展可能。如去潮梅：一、人地生疏。二、顽固派仍可以扰乱抗日后方口号打我。三、将牵动当地灰色武装的暴露，不然不能生存。”^④“五八指示”完全否决广东省委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提出的宏大而无法实现的“五岭计划”，明确要求曾、王两部返回“东宝惠”，积蓄力量，以待华南时局的变化。

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对曾、王两部的指示后，5月17日致电中央和南方局表示完全同意。^⑤6月，广东省委在南雄召开执委会议，总结了曾、王两部东移的教训，确定今后重点为敌后和前线，并决定由东江特委统一领导曾、王两部。1940年8月，曾、王两部历经险阻返回“东宝惠”。9月中旬，东江特委在宝安县鸡公头山畔的上下坪村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曾、王两部坚持在“东宝惠”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扩大武装，建立以大岭山和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曾、王两部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尹林平任两个大队的政委，曾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王作尧任第五大队大队长。^⑥

曾、王两部重回“东宝惠”后，之所以选择以大岭山和阳台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除了这些地方党组织比较坚强、山地有利于部队回旋、与香港山水相连便于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

①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并南方局报告——同意中央对曾生部的指示》（1940年5月17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第259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3、755页。

④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第46页。

⑤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并南方局报告——同意中央对曾生部的指示》（1940年5月17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0），第259页。

⑥ 曾庆榴主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4—495页。

华侨的支援等有利因素外，也是充分考虑到日伪军、国民党军队的分布态势而决定的。在这一带，日军因兵力不足，占领区狭小，只是在增城至石龙，沿莞石公路至东莞城，再沿莞太公路、宝太公路至南头、深圳、沙头角一线驻军。而广九铁路从横沥至平湖，以及铁路以东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国民党军队忌惮日军，不敢西靠莞太和宝太公路。所以，北起东莞石龙，南止宝安南头，南北长约60公里；东至广九铁路，西至莞太、宝太公路，东西宽约15公里，总面积约90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是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据点的中间地区，是建立根据地比较理想的地区。因此，曾、王两部选择从这里重建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①

1940年10月，尹林平和梁鸿钧率领第三大队进至大岭山区，活动地区方圆130多平方公里，8个乡，10多万人口。此前1938年冬，王作尧带领东莞模范壮丁队来此活动，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39年建立党的大岭山区委，不少乡村组建抗日自卫队。第三大队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战斗和深入的群众工作，建立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上下坪会议后，王作尧率领第五大队继续留在宝安以阳台山为中心创建根据地。1940年10月，东江特委为统一和加强根据地军政工作，成立中共宝安县工作委员会，王作尧任书记。阳台山位于大岭山南面，宝安西部，东靠广九铁路，西临宝太公路至珠江口，南接宝深公路。日伪军3000多人驻在宝太公路沿线的松岗、沙井、西乡、南头和深圳、沙头角、布吉等地；国民党军队1000多人驻在广九铁路沿线的林村、塘厦、石鼓、平湖和观澜等地，对阳台山区形成三面夹击之势。因此，在阳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非常艰巨。^②但第五大队在发展主力部队的同时，也很注意地方武装建设。他们配合宝安县工委，组建有600多人枪的8个抗日自卫中队，并成立了抗日自卫总队。

此后，曾、王两部虽然受到日伪军队、国民党军队的多重夹击，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在“东宝惠”站稳脚跟，而且实力不断壮大并向周边扩展。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香港后，曾、王两部奉命派员挺进香港，^③组建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④1942年1月，广东省委在宝安县白石龙村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下游东莞、宝安、惠阳等地和珠江三角洲南海、番禺、顺德等地抗日游击区的军政工作。至此，以“东宝惠”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南党组织在广东地区领导建立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建立和壮大，不仅有力抗击了日军，也“对坚定敌后各阶层抗日信心起相当作用”。^⑤7月10日，尹林平致电南方局和周恩来，建议公布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⑥12月2日，根据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基础上成立。东江纵队逐渐发展成为华南敌后战场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① 《曾生回忆录》，第168—169页。

② 《曾生回忆录》，第181—183页。

③ 《方方、涂振农给中央电——港战事发生、粤南工作的意见》（1941年12月15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广州：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1987年，第167页。

④ 曾庆榴主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第511页。

⑤ 《林平给中央报告——关于中路敌后的具体环境情况》（1943年3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第250页。

⑥ 《林平致恩来电——我队面目公开对实际活动无碍》（1943年7月10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第267页。

结 语

综上所述,以“东宝惠”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华南敌后的简单展开,而是党组织综合多方面因素,正确估量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努力不懈开展武装斗争,充分发动广大群众、不断壮大抗日力量的结果。

与华北、华中相比,中共在华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为艰巨。一是中共党组织在华南的影响与力量较为薄弱。“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之变为游击区,红军之变为游击队,广暴、海陆丰等工作上屡次失败及过去盲动主义的影响,失败主义在南方是较严重的”;^①“群众中大革命失败的情绪及过去盲动主义的恶影响也还相当存在着的”。^②二是华南不同于华北和华中可以依托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里没有成熟的组织建设和军事干部可以迅速展开工作。尤其在闽粤边红军改编奔赴苏皖抗日前线、广西红军被桂系收编的不利条件下,其局面的开创更为不易。

1944年6月22日,叶剑英在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介绍中共敌后战场军事情况时表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③华南抗日根据地的规模、所牵制的日军力量及所承担的作战任务,与华北、华中等敌后战场不可等量齐观,但中共华南党组织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创建了坚强有力的抗日武装,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突破日伪军队、国民党军队的多重夹击,开创出华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壮大,巩固了华南敌后战场,有力策应了国内其他抗日战场和东方其他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

〔作者李翔,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黄石 435002〕

(责任编辑:刘 宇 耿显家)

①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报告——关于政治形势、党组织概况、群众运动和目前重要工作》(1937年12月12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69页。

②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关于广东共产党的工作环境和群众运动、武装斗争、反托斗争》(1938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第304页。

③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6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03页。